



珍
藏
版

貳
拾
壹

山東畫報出版社

老
照
片

OLD PHOTOS

「老照片」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徐方

忘不了的孙维世 杜高

几生修得住江安 余安东

20世纪末：俄国人镜头下的中国西北 胡剑

外国友人在南京的出游 陈晓阳





1964年

姓名 顾 准

性别 男 年龄 48

单位 经济研究所

职 别 _____

科 字 第 10322 号

顾准的北京科学会堂出入证

顾准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后，1958 年下放农村劳改，于 1962 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学部经济所。此枚证件，系顾准的北京科学会堂出入证，颁发于 1964 年。凭此证可进出该会堂的俱乐部、阅览室、餐厅等场所。顾准临终前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部分物品赠与生前对他多有照顾的张纯音母女。（参阅本辑仲方——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出版人 尹奎友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目 录

徐 方	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1
杜 高	忘不了的孙维世	32
王端阳	母亲刘燕瑾和凌子风	51
余安东	几生修得住江安	62
史耀增	小学生也演《梁秋燕》	83
王建新	我的童年在“东风”	87
幼 林	我们的“六一”	104
计永刚	我的祖父计舜廷	109
刘南征	1955年：阅兵军旗前的将军	116
柳 谋	怀念母亲	125
杨弘绪	父亲的信	137

胡 剑	19世纪末：俄国人镜头下的中国西北	140
孙 琳 马 剑	百年万州桥	158
齐红深 宋 群	画里画外“尔灵山”	161
陈晓阳	外国友人在南京的出游	176
冯克力	无处不在的“老照片”	188

封 面	1958年农村业余剧团的排演（史耀增）
封 二	顾准的北京科学会堂出入证（徐方）
封 三	1949年底的家庭合影（柳谋）



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徐 方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树德是近代著名中国法律史学家，上世纪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任翰林院编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有多种外文译本，是研究中国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我的外祖父张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学，由清华学堂保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开创了中国心理学专业，并亲任中国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心理学第一人”。

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是李大钊、胡适的亲炙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等三位女性，并称为“五四四公子”。

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各种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

1943年，母亲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二十九岁。

初相识

母亲与顾准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改，四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当时经济所的办公地点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白色木制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准伯伯回到所里第一天上班，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



1960年代，母亲在经济所办公室。



顾准，1960年代证件照。

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

事情始于1956年，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安排顾准去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任副主任，并根据顾准自己的要求兼做经济所的研究工作。而顾准在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了当时的一些理论禁区，并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该文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场价格、市场规律调节生产。文章提出了“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

这篇文章使顾准逝世二十年后获得了“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美誉，而在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试论》一文中的观点被定性为严重的右派言论，成了顾准的罪状之一；另一项罪名是“反苏”。他在参加综考会的中苏联合考察队，赴黑龙江探讨两国合作利用水力资源的时候，在坝址的选择上与苏方针锋相对，还对苏联专家傲慢无礼的态度以及损害中国利益的种种做法表示不满。他的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报告。当时兼任文教系统领导的康生，在看到顾准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说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康生这一表态，把顾准划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组织决定。

1957年母亲刚到经济所不久，顾准就被划成了右派。经济所要对他的右派言论进行“消毒”，上面给母亲布置了一项任务：写文章批判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母亲很年轻，刚三十出头，属于进步青年一类。她很快就写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标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后，当母亲和顾准伯伯一起回忆起母亲写的那篇批判文章，顾伯伯哈哈大笑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顾准于1962年回到经济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好与母亲同在一组。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头脑清楚，看问题敏锐，知识渊博。特别是在治学方面刻苦认真的态度，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顾准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的精神在

老干部中殊不多见。

给母亲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顾准那铮铮铁骨。“文革”初期，顾准受到更大的冲击，红卫兵勒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别人都小心翼翼把写好的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只在一张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了上去。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眼见那些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写下“读史”这两个字，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理性地看待“文革”。

据母亲讲：顾准做事非常讲原则，从不畏惧强权。“文革”中他给前来外调的人和本所的人先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句话都实事求是，从不为了讨好某人，或夹杂个人恩怨而写不负责任的话。“文革”初期，有几个红卫兵来到经济所，要求顾准写一份材料，说明上海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可他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红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红卫兵一连串打了十几个耳光。红卫兵见顾准怒目而视，也就打不下去了。后来顾准给他们的材料，仍然坚持写不知道这件事。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顾准那刚直不阿的品质与渊博的学识令母亲折服，此后母亲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顾准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

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1972年他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顾准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当时我都险些没钱吃饭了，几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1969年春节过后，顾准随同其他监管对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学部大院接受隔离审查。他虽然在此之前已被迫与夫人汪碧离婚，子女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可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妻子破镜重圆。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和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汪碧）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促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领导这才对他说了实话。汪碧的死讯，对顾准犹如晴天霹雳，让他悲伤欲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我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接下来恳求军宣队帮他找一下大女儿稽头（顾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见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顿饭，顺便了

解一下亲人的消息。军宣队领导同意了，派人去和嵇头联系，可她竟拒绝会见。孩子的绝情，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经历干校

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十五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母亲说她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时顾准任上海税务局长，三天两头签发关于税收的公告，满大街贴的都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被人们戏称为“布告局长”。没想到这位“布告局长”不久之后就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肃下台，落难后两度来到经济所，再后来竟成为她的好朋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备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们不都是人品好、学问高的好人吗？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亲友、同事当中是有名的。

记得刚下干校那会儿，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母亲开完会往宿舍走。这时，她看到老经济学家骆耕漠被困在遍布积水的泥路上。骆老是个知识分子老干部，某些方面很像顾准伯伯：早年参加革命，没上过大学，是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他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扬事件受牵连，被削去职

务，贬到经济所。“文革”期间更被打成“走资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冠以“叛徒、特务”嫌疑，一直挨整，没人敢跟他沾边儿。他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几近失明。息县是黏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变得异常泥泞，正所谓：下雨一泡脓，天晴一片铜。骆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脚踩到泥水里，抬腿时脚出来了，鞋却粘在地上。如果换了别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来。可骆伯伯眼睛看不见，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经站了多久，却无人相助。母亲见状，赶紧上前，帮他把鞋子从泥水中捞出，套在脚上。她知道骆老视力极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便告诉他雨夜行走千万别往亮处踩，因为亮处都是水，之所以发亮，是因为反射了月光。

1990年代初，骆老在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谈到这样一件事：干校期间，他因挨整被彻底孤立，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只有张纯音悄悄对他说：“我知道你的为人，绝不可能是叛徒、特务，你可千万要挺住啊！”

几年后，高建国见到笔者，谈到那次采访。他说骆老讲那件事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说：“当时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张纯音的那句话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

顾伯伯的胞弟陈敏之在他故去后撰文这样记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经一年多，耄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

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他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母亲考虑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而我们下来之前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带了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于是母亲想给顾伯伯送去一些。当时做这样的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顶与监管对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轻则大小会点名批判，重则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于是母亲想让我去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我那时已经懂事，对顾伯伯的种种遭遇深感同情，很愿意做这件事。记得我每次送的时候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刚下干校不久，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花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母亲曾跟我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要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他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

子放在车上。一路上他们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亦师亦友

1972年10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U字形两层的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住在这一层楼上。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十二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我家。

位于八号楼南边的七号楼，是一座一字型两层的筒子楼，也用来安置从干校回来的“无家可归者”。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就住在七号楼一层。他们家的后窗正对着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时候他们常打开后窗通风。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时在家里拉开喉咙放声高歌，这时钱先生家的后窗很快就会关上，可他们从来不找我们家提意见。一次我在大院里碰到钱钟书先生，他操着带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令弟的歌喉不错啊！”听得我差点儿憋不住笑出来。

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这些“死老虎”。顾准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顾准在北京中山公园。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

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圣经），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1961年2月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一次，顾伯伯在谈话中用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把“鸩”字读成了chén，母亲说：“你这个字读错了，应该读zhèn。”结果两人争执起来，互不相让。这时顾伯伯从书架上抽出刚刚在内部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查出“鸩”字果然读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得，我认输了。过去上学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